俄罗斯文学中民族思想表象下的“帝国意识”研究

姜磊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勇敢善战的民族, 他们崇尚英雄, 对祖国怀有着涩而深沉的爱, 且其民族性格具有极强的韧性和硬度。俄罗斯人固有的“大地崇拜”思维逐步转化为“神圣罗斯”的理念, 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又蜕变为民族主义的思想, 上述思想都与俄罗斯的弥赛亚学说紧密联系。“帝国意识”也随着上述思想从萌发走向成熟, 乃至得到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 似乎存在一个隐性的俄罗斯(Невидимая Россия)。可以说, 由“土地崇拜”演化而来的, 在“神圣罗斯”理念与“弥赛亚”意识表象下的“帝国意识”是贯穿俄罗斯文学的线索之一。

关键词: 神圣罗斯; 弥赛亚意识; 土地崇拜; 俄罗斯思想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3-0190-08

俄语中的“Земля”一词来自原始斯拉夫语“земля”, 其源头是印欧语中的“ghem-”, 它有“地段、地区, 领土的一部分”和“国家、政权”的语义。^{[1](320)}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中, 土地可以视为“领土的一部分”, 乃至与“国家和政权”等同。“领土、国家和政权”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 他们都强调归属权。换言之, 俄罗斯民族对于土地有着极强的诉求。这种诉求则与该民族的性格不无关系。民族性格首先与生存环境有必然联系。在古罗斯时期, 俄罗斯民族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 那里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冬天漫长且寒冷。“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 他们必须要战斗, 而这是一场苦斗, 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冽极风。”^{[2](690)}严酷的自然环境使该民族变得非常刚毅和剽悍, 缺少天然屏障的平原地形则迫使他们时刻警惕敌人的侵袭。战争作为最重要的生存法则逐渐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信条, 而战争的胜利带来的不仅是民族安全, 还有领土版图的扩大和英雄主义崇拜的长盛不衰。

从民族成长角度看,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混融型民族, 其中融合了斯拉夫人、佩切涅戈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武装海盗瓦利亚格人的基因。瓦利亚格人所携带的海盗遗传因子和蛮族佩切涅戈人的蛮横习性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剽悍作风和斗争精神。构成俄罗斯民族主体的是斯拉夫东部分支, 他们从喀尔巴阡山的各个斜坡进入俄罗斯平原, 在上面过着游牧迁徙

的生活。公元9世纪, 古罗斯人为了抵御外敌和稳固内部局势, 邀请瓦利亚格人来做统治者。随之众多的瓦利亚公国(Варяж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出现在古罗斯大地上, 其中南部的基辅公国(Киев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和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公国(Новгород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最为强大。基辅公国逐渐成为政治中心, 它融合了其他公国, 最终发展为基辅罗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其后, 伊凡三世基本统一罗斯, 伊凡四世则加冕为“沙皇”, “沙皇俄国”(Росс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俄罗斯民族从起源到发展, 再到壮大的历程中, 向外拓展的冲动始终充盈于该民族的心灵, 这种冲动历经了从隐性到显性的演变。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俄罗斯从发展明显滞后的民族逐渐成为世界强者之一, 在此期间, 他们抓住了东罗马灭亡、1812年卫国战争等文化事件所带来的发展契机, 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 使俄罗斯思想从幕后走向台前。隐性的俄罗斯在某些历史文化语境中也变为熠熠生辉的发光体。然而, 在俄罗斯文学中, 民族向外拓展的冲动, 也即其“帝国意识”总是披上各种民族思想的外衣。换言之, 在文学中, 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隐性俄罗斯”。

纵观俄罗斯历史, “移民和国土开拓是俄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情。”^{[3](26)}伊凡四世摆脱蒙古-鞑靼人的统治, 将阿斯特拉罕和窝瓦河地区并入俄国, 使顿河哥萨克臣服, 从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彼得大帝发动

收稿日期: 2014-12-13; 修回日期: 2015-0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13&ZD126)

作者简介: 姜磊(1986-), 男, 浙江兰溪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宗哲学

与瑞典的战役，取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使俄国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将俄国国界一直延伸到远东，获取了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直至阿拉斯加。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等则将高加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使俄国在远东的版图进一步扩大。然而，俄罗斯的帝国身份往往被外界所忽略。俄罗斯大多数时候是一个隐性的帝国。缘由有以下几点：首先，俄罗斯是一个陆地国家，因而它并不像英、法等国那样曾拥有诸多海外殖民地，其领土版图的增长显得相对隐蔽。其次，俄罗斯史学家极力回避领土问题，对此讳莫如深，以至于几乎所有俄罗斯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俄罗斯的版图从一开始就当如是。俄罗斯名歌首句“我的祖国是多么辽阔啊……”与古罗马歌曲所唱“我的祖国延绵不绝……”如出一辙。歌曲的作者显然对这种明显的相似毫无察觉，这是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архетип культуры)。^{[4](170)}第三，俄罗斯文学家也有意识地淡化领土问题。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意弱化，或者通过叙述手段降解了这种“帝国意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思想是其真正的内核。俄罗斯文学自古以来就肩负着“文以载道”的重任。俄罗斯文学不乏“揭露帝国的恶，同时必须以帝国，必须以俄罗斯之大为前提”^{[5](213)}。俄罗斯文学作为其“帝国意识”的重要维度具有某种必然性。正如《帝国描述》中所指出的，“帝国关系的建立需要依靠武力、狡诈和传播疾病等手段，而帝国关系的维持，需要大力仰仗文学文本。”^{[6](207)}换言之，文学是帝国话语的重要构件。

长久以来，俄罗斯文学彰显的帝国意识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论题之一。林精华在系列论文《“去帝国化”何以可能——对苏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认知》《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关于认识后苏联的方法论问题》《后苏联的文学生产：俄罗斯帝国情怀下的文化产业》等论文从宏观视角阐释了“帝国心态”影响下的后苏联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提出将后苏联文学视为帝国情怀在审美领域延伸的论断和认知方法论。武玉明的《帝国之后的自我装扮：阿库宁小说中的帝国意识》和刘志华的《〈阿桑〉：体现为高加索战争的帝国历史》则分别研究了侦探作家阿库宁系列作品蕴含的帝国冲动和马卡宁最新力作《阿桑》中展现出的帝国隐喻。本文意在探究俄罗斯文学中民族主义思想掩盖下的帝国意识萌发及其流变。

事实上，自《伊戈尔出征记》^①(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以下简称《出征记》)以降，俄罗斯文学逐渐形成了对“帝国意识”独特的隐性书写范式。

一、“大地母亲崇拜”意识下的伊戈尔出征

国内外学界一般认为《出征记》是一部歌颂英雄主义的史诗性作品。《神圣罗斯：俄国文明百科辞典》评价道：《出征记》“是一部俄罗斯古代文学的杰作，它证明了当时俄罗斯文化的高度发展，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7](899)}然而，笔者认为将《出征记》视为单纯歌颂英雄与爱国主义的杰作有其片面性和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便是伊戈尔公出征的正义性问题。伊戈尔(Игорь)出征是保卫罗斯，还是占领他族领地？换言之，这是伊戈尔公代表国家和民族的保家卫国的忠义之举，亦或是个人私欲使然？

据史料记载，1183—1185年，留里克(Рюрик)和斯维亚特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数次与波洛维茨人大战，且他们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伊戈尔公未能参加俄罗斯诸侯的联合征讨，于是在1185年，在未取得基辅大同意的前提下，伊戈尔同弟、子、侄一起，召集军队，擅自向波洛维茨人进攻。伊戈尔等人“纵马如飞，好似原野上的灰狼。为自己寻求功名，为公爵寻求荣光”^{[8](48)}。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保卫罗斯免受异族的侵略，毋宁说是为了个人建立功勋，为了拓展地盘和稳固自己的权力，是一种主动攻击。也就是说，出征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并不充分。当天象异变、凶兆显露之时，伊戈尔仍然信誓旦旦地对其亲兵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杀身成仁！跨上你们的坐骑，饮马蓝天的顿河之滨！……即使碎首黄尘，我也要用头盔舀顿河水痛饮！”^{[8](49)}显然，这种“功利之心遮蔽了公爵的理智，饮马之欲淹没了上苍的启示”^{[8](48)}。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伊戈尔并非基辅大公，而仅仅是罗斯诸公之一，他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罗斯。因此，将伊戈尔擅自出征看作是保卫国家的行为是不妥当的。

伊戈尔等人初战突袭波洛维茨人，“抢走波洛维茨姑娘，连同绫罗绸缎和金银首饰；用抢来的车帷、外套和皮袄，还有波洛维茨人各种细软铺垫沼泽和泥泞的土地。”^{[8](50)}可见，伊戈尔的军队并非是出于自卫，而是对波洛维茨人进行了洗劫。他们掳走妇女充当奴隶，抢夺一切值钱的东西，进而肆意挥霍，将金银细软和皮袄外套作为铺垫沼泽的材料。伊戈尔军队的行为进一步昭示了出征是维护私利之举。伊戈尔的出征远非值得歌颂的英雄行径。然而，伊戈尔出征也并非单纯的“侵略”，而是一次宗教讨伐，他们攻打的波洛维茨人是“异教徒”。伊戈尔等人是“……为正教事业

而与污秽之众战斗的公爵和亲兵”^{[8](64)}。也就是说,伊戈尔出征具有了宗教合法性,它完全符合罗斯民族“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的理念。罗斯人自认为是最后接受上帝的民族,因而与最先接受上帝的犹太族一样神圣。这种“始”与“终”等同的观念以《圣经》为理论支撑。《圣经》言:“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也是终。”^{[9](299)}换言之,罗斯是神选之邦,因而它是无比神圣的。

在“神圣罗斯”意识的指引下,尽管伊戈尔的行为并非大无畏的英雄行为,且伊戈尔大公也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手记的作者依然将其视为伟大的英雄。当被俘的伊戈尔成功逃脱之时,作者对他的书写是英雄赞歌式的。书中写道:“伊戈尔沿波利切夫道路上坡,来到毕罗哥什圣母大教堂。老人喜悦,全城欢腾。歌唱老一辈公爵,也歌唱年轻诸公。”^{[8](64)}显然,伊戈尔等人被认为是罗斯的英雄,他们虽败犹荣,是罗斯人民的骄傲与光荣。民众高喊:“光荣啊,伊戈尔·思维亚特斯拉维奇!光荣啊,符塞弗洛德和弗拉基米尔·伊格列维奇!”^{[8](64)}《出征记》的作者认为不仅伊戈尔公、其子、其侄是英勇的与光荣的,而且所有俄罗斯的儿子都是值得赞颂的,彰显了其“对军人英勇精神的特殊酷爱”^{[10](173)}。这种书写回避了伊戈尔公出征的法理性问题,将伊戈尔等人塑造成了为“神圣罗斯”事业牺牲自我的大无畏英雄。

利哈乔夫认为:“罗斯的割据性在《出征记》中被艺术地克服了:自传号召读者凝视和倾听作为统一,不可分割的和‘轻灵的’完整罗斯。”^{[10](169)}《远征记》作者用艺术的方式使读者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大地不容分割,即伊戈尔公的对外征讨是神圣罗斯统一事业的一部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义性。换言之,罗斯人对于土地的占有具有了预设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根源与罗斯民族多神教信仰中的“大地崇拜”相关。多神教认为万物有灵,崇拜风雨雷电和山川草木等等自然实体和现象。“大地崇拜”是多神教信仰中的重要内容。在古罗斯人的观念中,大地是与水、火、空气一道构成宇宙的四种基本要素之一。^{[7](313)}俄罗斯人从古至今都将大地视作最为圣洁的崇拜对象。他们在诸多仪式和重要时刻都要亲吻大地。古罗斯人将大地视为自己与祖先联系的媒介,从而使大地崇拜与祖先崇拜形成密切联系。多神教将“大地”唤作“润泽的大地母亲”(Мать-Сыра Земля)^{[11](32)},是世间万物的源头。在多神教神学视域下,“大地”是有性别的,或者说是一种母性的代表,因为“大地”和所有带有母性特征的事物一样拥有生产、繁衍功能。著名的约翰神父曾说:“大地是女性的。在古代的手稿中她有时被描绘成

老女人。她有一个受洗的名字——达吉雅娜。”^{[11](32)}无独有偶,在俄罗斯学者和作家眼中,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国度。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都将俄罗斯视为具有女性气质的国家,而勃洛克则直呼其为“我的俄罗斯!我的妻子!”^{[12](105)}

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以前,多神教是罗斯社会精神生活的绝对主题。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的几个世纪,多神教依然和基督教一起主宰着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即罗斯社会的双重信仰现象。即使是到了20世纪初,在俄罗斯的偏远地区仍然可见多神教的身影。皮里尼亚克的《地母》中,挪窝和请家神的仪式是多神教信仰在俄罗斯文化中传承的缩影。多神教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多神教的信仰和宇宙观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有着深远的甚至是不可磨灭的影响。”^{[13](60)}多神教是俄罗斯民族信仰的底色。“土地崇拜”是多神教的核心内容之一。换言之,“土地崇拜”意识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荣格所谓的排除“完全是个人的,以及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的经验性精神”,而存在的“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适性、非个人性本质”,且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共有的精神层面。^{[14](37)}值得注意的是,《伊戈尔出征记》写于12世纪,此时基督教虽已成为国教,但多神教的影响远未消除。诚如国内外学者所言:“从《伊戈尔出征记》的叙事内容来看,多神教的崇拜和信仰表现的较多。”^{[15](98)}在多神教信仰占优势的文化语境中,《出征记》的作者完全意识不到伊戈尔公对他族土地占领的非法性。随着罗斯强硬的中央政权的建立,这种“土地崇拜”逐渐嬗变为“民族主义思想”和“弥赛亚”意识,最终成为“帝国意识”的思想基础。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如此之大不是偶然的。这种大是命中注定的,而它又和俄罗斯民族的思想 and 使命联系在一起。”^{[5](213)}《出征记》后的俄罗斯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乃至隐藏这种“帝国意识”,或者将这种“帝国意识”以新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

二、“神圣罗斯”理念表象下的民族主义思想

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是普希金流传于世的杰作之一。他用唯美的语言叙述了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与黑眼睛的切尔克斯姑娘之间真挚而又无奈的爱情。俘虏由于机缘巧合得以遇到纯真的切尔克斯女郎,然而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预示这种爱情不但是脆弱的,而且是虚幻的。从传统意义

上说，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往往被认为是讴歌爱情、自由的经典之作。

诚然，普希金在《高加索的俘虏》中表达了对俘虏与女郎之间这种纯美爱情的传颂；展现了对高加索文化中那种自由豪放、无拘无束生活的无限向往；彰显了对于切尔克斯人勇猛善战、淳朴好客由衷的赞赏。他将高加索塑造成自由与爱情的圣地和文人骚客的向往之所。这种将高加索形象神圣化的处理方式营造出了“高加索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命题成立的语境，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爱情故事这一载体实现的。俘虏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贵族，是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代表，而切尔克斯女郎是乡野丫头，是“自然社会”的化身。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像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之间擦出的火花，因而其结果具有了无法回避的悲剧色彩。作家也以此来凸显高加索是一种落后、未开化的文化。更重要的一点是，作家强调了“文明”对于“自然”的征服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在作家看来，俄罗斯对于高加索的征战是一种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因而毫无疑问也具有了法理依据。显然，这是一种饱含民族主义(национализм)情绪的思维方式。俄罗斯认为对高加索的征战是一种“救助”，它正是通过这种对其他民族的“救助”，巩固自己的世界使命意识。当民族遭到侵略时，“神圣罗斯”理念与爱国主义激情被激活，并以深沉的爱国思想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表现出来；而当俄罗斯处于稳步发展时，对他国的拯救意识便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表现为民族主义乃至大国沙文主义。也就是说，“过度自大和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将会抑制该民族的个性。民族主义应该明确自己的界限，一旦越过这一界限，就不再是民族主义，而是帝国主义。”^{[16](113)}诸如“高加索，快低下你雪白的头颅，归顺吧，迎接来征讨的叶尔莫洛夫！”^{[17](168)}“战争狂暴的呐喊平息了，一切俯首于俄罗斯刀下”^{[17](156)}等诗句折射出了作家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源头是俄罗斯民族的“神圣罗斯”理念。

在叙事诗《波尔塔瓦》(Полтава)中，普希金将民族主义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俄国与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鏖战。在普希金看来，夹在两个大国间的乌克兰独立运动对俄国而言是一种彻底的背叛。正是“波尔塔瓦战役确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命运……解决了俄罗斯首都在哪里的问题。这场胜利牢固地将两个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10](291)}。然而，这种“牢固的结合”完全立足于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忽视了乌克兰的民族感受。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对于俄罗斯有益的行

动即是合法的，也就是别尔嘉耶夫所言的“俄罗斯——也就是神圣的罗斯。或许俄罗斯有罪，但有罪的俄罗斯仍是神圣之国，是为神圣理想而献身的国家”^{[18](279)}。无怪乎有俄罗斯学者感叹：“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帝国思想，其本质是强调俄罗斯对于其他斯拉夫民族和非斯拉夫民族的特殊权力……”^{[19](12)}

在《高加索的俘虏》的尾声中，普希金写道：“我要歌颂那光荣的时辰，在那时候我们的双头鹰嗅到血腥的战争，便飞上那愤怒的高加索的山峰；那是茫茫的捷列河上第一次响起战争的雷霆和俄罗斯的咚咚的鼓声，盛怒的齐齐阿诺夫来到谢列，傲视一切、威风凛凛；我歌唱你，高加索的魔王，福特梁列夫斯基啊，英雄！无论你风暴般飞向哪里——你的行踪像一场黑死病，杀尽灭绝了那里的人种……”^{[17](155)}齐齐阿诺夫、福特梁列夫斯基和叶尔莫洛夫都是俄国征服高加索进程中的指挥官，是屠杀山民的刽子手。这些罪行累累、臭名昭著的“魔王”却是作家笔下的英雄，受到了热烈的讴歌与称颂。作家借助于讴歌英雄，赞美他们为祖国开拓疆土的英勇气概代替了俄罗斯对于高加索的征服，强化了征讨的合法性。英雄是“人类信心、力量和道德的化身，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理想”^{[20](103)}，他们代表的是正义与勇敢，英雄的行为自然也携带了正义的DNA。这种英雄主义思想也源于“神圣罗斯”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关照下，那些“魔王”们的行为才具有了英雄色彩。

在《波尔塔瓦》中，彼得一世是作品的重要人物之一。彼得“容貌威风凛凛，步履矫健，神采奕奕，活像一位天上的雷神”^{[21](356)}。在利哈乔夫看来，这种雷神般的容貌说明彼得的“全部事业——对某些人的个人命运而言是暴风雨般的和可怕的恐怖的事业，而对各民族和国家命运是有益的事业”。这种解读折射出，民族主义的情绪是俄罗斯民族思维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无意识。将彼得视为“天上的雷神”般的人物意味着他的事业的神圣性，他的风暴是上帝的风暴，因而他是承载上帝使命的“合法”君主，从而与“阴谋叛变者——马泽帕”以及“好大喜功的狂人——查理十二”相对立。至此也就完成了从对神圣化的彼得的赞颂到对其事业不容否认的褒扬的转化。俄罗斯学者斯托尔恰克认为，在政教合一的俄国，沙皇就是救世主——弥赛亚。沙皇不仅仅是国家元首，也是国家的象征，更是神圣天赐与超自然力的化身，彼得“从天上发出了动人的，响亮的声音”^{[21](357)}。普希金将彼得直接视为天神，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是深受上帝眷顾的国度，因而它是“神圣罗斯”。

“神圣罗斯”的理念充盈于普希金的诗作中,对源于这一理念的英雄主义的讴歌则表现出作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和20世纪,民族主义情绪和弥赛亚意识交织、融合,且不知不觉地互相转化。”^{[16](104)}所有这些思想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都有可能演变成“帝国意识”。

三、“欧洲救星说”的本质—— 弥赛亚学说

《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是一部歌颂人民和“人民思想”的史诗性作品。俄国人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民族韧性、顽强的意志力和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俄国人深沉而厚重的爱国主义情操。

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与和平》也是“帝国意识”隐性书写的巅峰之作。通过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杰作,因克里木战争失败而遭受损害的俄国的形象得以完美重塑。就作品酝酿和创作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重塑俄国的国家形象是完全必要且合适的。虽然俄国在争夺黑海出海口的战役中遭到重创,丧失了塞瓦斯托波尔,签订了《巴黎和约》,而在其他战场上,俄国却高歌猛进,远东和高加索地区几乎完全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了。换言之,此时俄国的“帝国意识”并未受到损害,而是正处于高亢的状态。此时的俄国依然充满信心,它正在将历代传承的“帝国意识”逐渐付诸实施。因而,《战争与和平》的问世是十分符合时宜的。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描写了1805—1820年间的历史事件,法俄之间的几次战争和战后的和平生活。作家选择1812年卫国战争作为主干素材是作家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反击战,俄国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托尔斯泰极力突出正义性是战争胜利的前提和保障。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战争之正义和非正义因素无论是在冷兵器和热兵器时代皆不过是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之间出于政治需要或因实力不济找到的借口而已”^{[22](39)}。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不仅描写了1812年卫国战争,也叙述了1805—1812年之间的历次战争,同时,这些战争的战场并非在俄国境内,恰恰是俄国周围的恰如波兰、捷克之类的国家。比如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战场并不在俄国境内,而是位于捷克。换言之,托尔斯泰使这些发生在他国领土上的“保卫俄国的战争”获得了道德支撑,而忽略了战争给邻国带来的灾难。或者说,托尔斯泰首先设定了这样的前提,即“卫国战争”是

法国(或者欧洲)与俄国的较量。他有意地模糊了边界概念,俄国周边的广阔地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其势力范围。俄国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认为:“俄国的统一、完整与解放斯拉夫民族是两句口号,正是以这两句口号的名义爆发了战争。”^{[23](354)}也就是说,在俄国人的潜意识中,斯拉夫世界的统一与完整与俄国的统一是等同的。俄国军队驻扎在奥地利大公治下的土地上,统帅库图佐夫将大本营设在布劳瑙,士兵们自然而然地将其称为“布鲁诺沃”^{[24](132)}。“布鲁诺沃”显然是一个具有明显俄国文化印记的名称,而通过命名的方式,无疑宣告该地的“俄国化”已经完成了。

这场战役最终以俄国人的胜利而告终,而他们的敌人是“不可战胜”的欧洲之王——拿破仑。作者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俄国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强如拿破仑也不可能征服俄国,因而俄国是无冕的欧洲之王,或者说“只有俄罗斯才应当是欧洲的救星”^{[24](5)}。这不仅完全修复了俄国的国家形象,而且使其更加伟岸和强大。如果说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使在他国领土上爆发的卫国战争前后的历次战役获得了道德依据,那么“欧洲救星说”则使之获得了真正的合法性。因为,“只要有俄国这样以野蛮落后闻名于世的强国,大公无私地出来领导以谋求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全世界就有救了。”^{[24](14)}这种“欧洲救星说”本质上又是“弥赛亚学说”(Мессианизм)的一种表现形式。弥赛亚(мессия)来自希腊语“μωσσιας”,指基督耶稣,即犹太人的救世主。^{[25](530)}弥赛亚意识,也即拯救世界的思想,它与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密切相关。“俄罗斯从拜占庭接受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俄罗斯人的先知的预感、神秘主义沉思、启示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弥赛亚精神显然都源于拜占庭的宗教和文化。”^{[13](61)}随着罗马帝国的崩塌,俄罗斯成为了东正教唯一的传承者,即“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正式确立。“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是一个关键节点,“俄罗斯思想从‘神圣罗斯’转变为‘拯救世界的罗斯’。这种思想完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第一个周期。”^{[19](36)}那种渴望承担起上帝选民重任的诉求得以进一步加强。

弥赛亚学说包含两个核心:谁是弥赛亚——救世主与如何拯救世界。救世主即上帝选定拯救世界之人,也就是选民意识的根源。俄罗斯民族的选民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在《古史纪年》中已有记载,“雅弗的后裔包括:瓦利亚人、瑞典人、诺曼人、罗斯人……。”^{[26](2)}涅斯托尔(Нестор)将俄罗斯人视作诺亚的后裔,显现出上帝选民的思想。《圣经·创世纪》言:“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

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27](5)}既然诺亚是上帝亲自选定的义人，那么作为其后裔的俄罗斯人自然也是上帝的选民之一。东罗马帝国的覆灭给予俄罗斯人要承担上帝选民的弥赛亚意识以更加合法的地位。从宗教层面看，纯正的弥赛亚意识是一种牺牲意识，是为世界和世界上各个民族服务的使命意识，是拯救人类脱离恶与困苦的意识。换言之，真正的弥赛亚意识的本质是牺牲与奉献。然而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弥赛亚意识往往会发生异变。俄罗斯哲学家 C. 布尔加科夫认为：“清楚地看到了弥赛亚意识很容易就会转化为通常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想。”^{[23](338)}在他看来，“选民的思想极其容易蜕变为一种自我优越感，尽管这种思想本该使人萌发强烈的责任感和加强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民族的禁欲主义应该作为弥赛亚意识的界限，否则弥赛亚意识会转化为令人厌恶的、漫画式的民族主义。”^{[23](338)}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弥赛亚意识经由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帝国意识的通道从未关闭。

“强力意志——扩张——战争，国家一直奏着这样的三部曲。战争是国家的命数。”^{[28](111)}战争是一种极端的展示文化的舞台，也是拯救世界的重要方式。俄罗斯战争往往具有宗教性质，是一种圣战。“1812年卫国战争未打响之前，东正教教会通过遍布俄罗斯各地的教区组织(приход)宣扬体现教会和沙皇意志的‘神圣宣言’中的爱国精神，且这个祖国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基督之爱一体的俄罗斯帝国。”^{[22](37)}正是通过战争这个载体，“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这种俄罗斯的弥赛亚说中，天国的、真理王国的纯粹的弥赛亚思想被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弄得模糊不清了。”^{[5](193)}也就是说，弥赛亚思想的世俗化与俄罗斯的帝国意识有着因果关系。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是极其特殊的，它和俄罗斯国力、强盛紧密联系，和沙皇的特殊地位相关。于是，俄罗斯帝国的诱惑便渗透到弥赛亚意识中。”^{[28](49)}借助 1812 年的卫国战争，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演变成了“帝国意识”，且它得到了付诸实践的机会。

托尔斯泰的写作重点是拿破仑自西向东的入侵和库图佐夫将其赶出俄国这一历程。他有意识地避开了其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组织同盟军对狼狈逃窜的拿破仑进行追击，直至攻破敌军首都巴黎，乃至长期驻军那里的史实。俄国军队在卫国战争中不仅仅是将“法兰西恶棍”赶出了俄国，同时，“沙皇未遇抵抗，进入波兰首都。华沙大公国即告夭折，整个波兰成为俄国附庸”^{[2](1043)}。然而，托尔斯泰将俄普奥盟军长驱直入攻占巴黎的行动解释为“是为了恢复各国国界，是那

么必需，正如库图佐夫为了拯救俄国和俄国的光荣而必需一样”^{[24](1212)}。这种说法隐约可见的是其背后在“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弥赛亚思想掩盖下的“帝国意识”。事实上，1812年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俄国的确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

《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塑造同样遵守“帝国意识”隐性书写的原则。1812年的卫国战争将这些人物置于艰难的境遇中进行“煅烧”，提炼出的正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英雄主义情怀。作家塑造了包尔康斯基一家，罗斯托夫一家和比埃尔·别祖霍夫等人物，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所展示出的爱国精神传递出俄国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几乎完美的国家。若非特意观照，读者难以发现隐藏在作家对俄国优秀贵族赞颂之下的重塑国家形象的意图。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的“普鲁士王”的绰号绝非偶然之笔。它暗含着作家对于为国家征战的英雄的最高褒扬，凸显出其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尊崇，哪怕是省长也认为拜见他是应尽的本分。“他为人虽不冷酷，但却引起连最冷酷的人也难以得到的那种对他的敬畏。”^{[24](98)}这种敬畏来自于他的赫赫战功和出生入死的经历，这是对英雄的由衷钦佩。在儿子出征前，老公爵给予他的礼物是一把“从奥恰科夫城下带回来的”佩刀。奥恰科夫原为土耳其的著名要塞，是苏沃洛夫将军在 1787—1791 年的俄土战争中将其纳入俄国版图的。这种细节的描写无不彰显着托尔斯泰对于开疆掠土的功勋将军的颂扬。这种颂扬最终以老公爵告诫安德烈的那句名言而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主义。他说道：“假如你被打死，我老头子会难过的……我要是听说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包尔康斯基的儿子，我就要……感到羞耻！”^{[24](122)}这种对于英雄主义的热情讴歌又与《出征记》《高加索的俘虏》等作品如出一辙。

彼埃尔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大贵族，其父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红人和大富翁。彼埃尔继承的田园、产业并非全都在大俄罗斯，而极大一部分在小俄罗斯，在基辅和敖德萨附近的地区。此外，他在克里木也有庄园和产业。作家以极其自然、平和的笔调对上述地区的人文自然风貌进行了描写。换言之，在以作家为代表的俄国人的视域下，这些土地是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书写手法则将这一潜在的信息完美地透露给读者。如果说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一个倾向于西方的贵族军人，他对拿破仑不无赞赏，称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24](27)}，那么彼埃尔·别祖霍夫虽有西方生活经历，却是一个纯正的俄国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包尔康斯基注定要英年早逝，而彼埃尔逐渐

克服身上固有的贵族习气,最终和罗斯托娃共同生活下去。作家将这个拥有纯洁俄罗斯灵魂的人视为俄国的未来,他的形象如此完美和有代表性,从而衬托出生活在俄国的人都是这般美好,那么俄国也就是个无与伦比的国家。至此,帝国的形象也完成了最后的修饰。

四、结语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说:“拿破仑可能会打败我们的,而且胜算极大。但他那样也不得安宁。……我们有广阔的国土可以后退。……我们要让天气,让冬天来和敌人作战。……即使退到勘察加半岛,也绝对不割让一寸国土。”^{[2](755)}作为一国元首的沙皇在土地问题上丝毫不让、锱铢必较的态度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的“土地崇拜”意识、“神圣罗斯”理念和其后的“帝国意识”的显影。

事实上,沙皇的预言在百年之后成为了现实,法西斯德国一度将苏俄逼入绝境,而正是巨大的战略纵深,国民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再次使苏俄反败为胜。二战这一历史事件对于苏俄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崛起契机。正如邦达列夫在《岸》中所展示的,苏军率先攻入帝国的核心柏林城,“柏林最后一道防线——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被打下来了”^{[30](97)},被视为邪恶化身的希特勒饮弹自戕,俄罗斯民族再次扮演了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角。苏俄帝国虽经历战争而变得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然而帝国意识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帝国完成了质的变化。

“俄罗斯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地域: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往西伯利亚流放(犯人),用武力征服高加索。”^[31]这两个地方正是俄罗斯帝国拓展版图的前线。以西伯利亚题材为创作资源的拉斯普京是现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帝国意识的忠实书写者和传承者。在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告别马焦拉》《火灾》等乡土系列作品中,西伯利亚的历史被淡化,土著文化成为一种次文化,彻底边缘化,而俄罗斯文化作为强势力量统辖着社会。当代作家马卡宁则在《高加索俘虏》《阿桑》等高加索系列作品中强调先进的俄罗斯文明与落后的高加索自然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俄罗斯帝国征讨高加索寻求文化支撑。

“帝国意识”历经嬗变逐渐成了俄罗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其的独特书写是贯穿俄罗斯文学的隐性线索之一。

注释:

- ① 也译作《伊戈尔远征记》,本文采用黑龙江大学李锡胤教授的译法,据考证,伊戈林的军事行动不过500余俄里,故译作《伊戈尔出征记》。

参考文献:

- [1] Шапошников А. К.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10.
- [2]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第10卷)[M]. 幼狮文化公司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3]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第1卷)[M]. 张草纫, 浦允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4] Степанов Ю. С.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зд. 3-е, испр. И доп. [M].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4.
- [5]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 邱守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 [6] 陶家俊. 后殖民[C]// 赵一凡, 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7] Платонов О. А. Святая Рус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Z]. Москв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0.
- [8] 李锡胤. 伊戈尔出征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新约全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 [10]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M]. 吴晓都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金亚娜. 期盼索菲亚: 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女性”崇拜哲学与文化探源[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12] Блок А. А. Изборник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 [13] 金亚娜. 俄罗斯的种族宗教文化记忆[J]. 国外社会科学, 2003(5): 59-65.
- [14] 荣格.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 徐德林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 [15] 任光宣. 伊戈尔远征记及其表现的双重信仰[J]. 国外文学, 1994(1): 96-99.
- [16] Бердяев Н.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M]. Москва: ФО СССР, 1990.
- [17] 普希金. 普希金长诗全集[M]. 田国彬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 [18] 别尔嘉耶夫. 自我认知[M]. 汪剑钊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9] 郭小丽. 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0] 王岚. 英雄[C]// 赵一凡, 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21] 普希金. 波尔塔瓦[C]// 余振, 谷羽译, 肖马, 吴笛主编. 普希金全集.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22] 郑永旺. 俄罗斯民族性格与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J]. 俄罗斯文艺, 2012(4): 36-40.
- [23] Трубецкой Е. Н. Два зверя. Статьи 1906—1919 гг. [M].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 [24] 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M]. 刘辽逸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5]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А.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Г. Лиснера и Д. Собко, 1910–1914.
- [26] 王松亭. 古史纪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7] 旧约全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 [28] 别尔嘉耶夫. 人的奴役与自由: 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M]. 徐黎明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 [29] Бердяев Н. А. О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 [30] 邦达列夫. 岸[M]. 索熙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
- [31] 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 Надежда Багдасарян. В России два знакомых места-Сибирь и Кавказ [N].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27 ноября 2008.

Imperial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national ideology in Russian literature

JIANG Lei

(School of Russ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ussia is a nation of bravery, whose people advocate heroes. Russian people have shy and deep love for their motherland, and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is full of strong toughness and hardness. Their intrinsic conception is gradually turned from “Earth Worship” into “Holy Russia”, and fades into nationalism in certain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Such ideolog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Messiah theory. And along with these Russian ideas, “Imperial Consciousness” has developed from germination to maturity, and even into practice. In a sense, there seems to exist an invisible Russia (Невидимая Россия). That is to say, the “Imperial Consciousness,” which evolved from the “Earth Worship” under the surface of “Holy Russia” and “Messiah consciousness,” is one of the clues of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Holy Russia; Messiah Consciousness; Earth Worship; Russian idea

[编辑: 胡兴华]